

日本佛教研究的現狀與課題

袁翰顯量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中文摘要

日本的佛教研究受制于歷史因素較多。最初傳入日本的是中國南北朝時的南朝佛教，重視講經與教理學習，因而日本的佛教研究有了偏於教理及思想研究的傳統。至近代初期引進了歐洲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更加強了這種學術傾向。

文獻研究已然成為日本佛教學界之主流。研究對象限於教理類著作，而對於如佛教民間傳說、受佛教影響之和歌及故事等文學作品的研究並不多。學者對於創作者的研究很熱心，對接受者的研究卻敬而遠之。

日本從古至今留存許多寫本資料，雖已出版各種叢書可管窺一二，仍有多種論義、唱導等寫本未見刊刻。目前雖有研究計畫在推動電子化寫本資料庫，但寫本本身仍不易入手。

海外有許多日本佛教的研究者，但本國研究者卻常忽視前者之研究成果，亟待改善之。日本歷史之時代區分不甚明確，且每個時代受重視程度也不同，事實上日本佛教研究者的興趣多集中於中世與近代。希望學者今後多關注古代與近世之日本佛教。

雖說教理研究占日本的佛教研究之主導地位，但論義、唱導等方面，尤其是宗派成形前的院政期至鎌倉時期的論義、唱導研究仍是空白。若將佛教分為「學」與「行」，可以說學界對於「行」的研究甚少，這很可能與日本佛教的歷史特色有關，也是今後需突破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關鍵詞：論義、唱導、行學、文獻學、時代區分、佛教學、歷史學、日本思想史

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5年01月，頁145-168

The State of the Field and Several Issues to be Resolved in the Study of Japanese Buddhism

MINOWA Kenryo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Abstract

History has placed certain limitations on the study of Japanese Buddhism. Buddhism came to Japan in the sixth century,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in China, via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took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ddhism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particular, the practice of preaching about Buddhist sutras, as well as a robust system of doctrinal learning, and these have been the focus of the study of Buddhism for the majority of its history. However,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Buddhist Studies advanced greatly with the advent of philological methods brought over from Europ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tyle of research, philological studies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Buddhist studies in Japan, however this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ideological o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while neglecting the study of mor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tanka* (poetry), as well as classical fiction and other narrative forms. In brief,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works focusing on writing influenced by Buddhism. Although there is a deep interest in the makers of Buddhism, as it were, those whom it was made for have been neglect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many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that remain from ancient Japan. Although some of these documents have been published with

modern typesetting, and thus made into a more accessible format, many have not yet been made into modern printed editions. In particular, documents recording sermons (*shōdo*) and debates (*rongi*), and sermons and debates from the Cloistered Government (*insei*) period to the Kamakura period are largely unstudied topics. Although there are projects that aim to digitize these documents, these have still not been developed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to be rectified i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rs outside Japan studying Japanese Buddhism,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seem to be by and large overlooked by those working inside Japan.

Although there is a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 there is nevertheless a tendency to study the Buddhism of medieval and modern eras, while neglecting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Finally, although we can broadly divide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to the categories of (doctrinal or academic) learning, and (religious) practice, the study of how Buddhism has been practiced, particularly how meditation (*samatha* and *vipassanā* styles in particular) has been practiced in Japan, has not sufficiently been discussed. This may be a product of the tradi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 but is nevertheless a question the field fac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ebate, sermon, practice, philology, periodization, Buddhist studies, Historical research, Japanese ideological studies

一、前言

本文擬對日本佛教研究之現狀與課題作一考察，首先論述方法論方面的問題，之後解析現況及其中有待改善的部分。

明治時代以來的日本佛教研究，對兩大學術領域影響深遠，一是佛教學、二是歷史學¹。當然日本佛教在美術史、建築史、宗教學及民俗學等領域的分量不容小覷²，但就其影響之深遠，仍以佛教學與歷史學為首。另外，近年從日本思想史學領域研究日本佛教的狀況也倍受矚目³。

※ 收稿日期 2014.9.19，通過審稿日期 2014.10.20。

- ¹ 若要舉出有代表性的學者，歷史學領域裡最受矚目的是二戰前的辻善之助（1877-1955）、黑板勝美（1874-1946）。辻善之助編撰《日本仏教史》全10卷（1944-1953年），此書對後代的研究影響頗大。二戰後學者有石母田正（1912-1986）、井上光貞（1917-1983）、黑田俊雄（1926-1993）、網野善彦（《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1984年）等。以石母田正的《中世の世界の形成》（1946年）為轉折，黑田俊雄在《日本中世の国家と宗教》（1975年）中提出顯密體制論，建立了此後中世佛教研究的大框架。
- ² 美術史方面有源豐宗（1895-2001）的《日本美術史論究》全6卷（1978-1994年）作為最早的研究受到關注。佛像彫刻方面有水野敬三郎的《日本彫刻史研究》（1996年）。密教美術方面有佐和隆研（1911-1983）的《日本の密教美術》（1961年）、賴富本宏編的《密教の美術》（1994年）及田中公明的《両界曼荼羅の誕生》（2004年）。建築史方面，二戰前的關野貞（1868-1935）以法隆寺的非再建論聲名鵲起，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最近比較有名的研究成果有藤井恵介論述寺院建築空間與法會的《密教建築空間論》（1998年）及山岸常人的《中世寺院の僧団・法會・文書》（2004年）。
- ³ 日本思想史學領域的研究，出身東北大學日本史思想史研究室的學者較為活躍，成果有源了圓、玉懸博之共編的《国家と宗教：日本思想史論集》（1992年）及佐藤弘夫的《日本国家と宗教》（2010年）等。2012年以降的研究有刈部直、黑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田尻祐一郎等編的

佛教在日本成為研究對象究竟始於何時呢？一想到此問題，自然就會上溯至佛教傳入日本前的久遠時期。雖說印度佛教中的眾多論書，讓我們聯想到佛教被視為學問的對象，但更確切地說，佛教不以一種宗教體驗而是很明確地成為一個學習對象而被傳承的歷史，應該說是開始於傳入東亞，尤其是當它在中國與講經的傳統不期而遇之後⁴。

在此回顧一下學問佛教的歷史。

二、方法論上的問題——以教理思想為主的文獻學研究

佛教學領域的研究，不知不覺間形成了一種默契，將研究教理和思想的文獻研究視為佛教研究的一種前提。這種默契的形成和日本佛教的歷史淵源甚深，可以追溯到飛鳥時代，藉法會而漸成氣候的教理鑽研，通過「論義」、「談義」等方式而形成的佛教教理的鑽研⁵。

論義過程中有一道程序，就是可以讓僧人一舉成名的「豎義」。豎義要求一人回答十個問題，此時的論義叫做豎義論義，回答問題之人被稱為「豎者」。平安時代以後，被推舉為豎者本身就意味著在佛教界出人頭地，因為南都三會的講師就從豎者中選出。南都三會包括興福寺維摩會、宮中禦齋會和藥師寺最勝會。此三會從平安時代初期到中期，一直是日本規格最高的法會，經歷法會講師之人將成為「僧綱」候選者，

《日本思想史講座》全5卷（其中4卷已刊）（2012-2013年），是跨領域的學術集成。此外，曾根原理的《德川家康神格化への道—中世天台思想の展開》（1996年）及伊藤聰的《中世天照大神信仰の研究》（2011年）等研究也很有名。

⁴ 中國南北朝時期，北朝有重視修禪的傳統，而南朝則受清談影響而重視講經。參照橫超慧日，《中国仏教の研究》全3卷，1958-1979年。

⁵ 蓑輪顯量，《日本佛教の教理形成》，2009年。

其慣例傳說為桓武天皇所制⁶。

法會論義形式雖從中國傳來，但隨著日本佛教的發展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從平安後期的院政期至鎌倉時代，奈良和京都兩地分別設置規格頗高的法會。在京都，二種法會之上設名為「三講」的最高法會，分別為法勝寺御八講、宮中最勝講、仙洞最勝講⁷。在法會做講義、當講師的人，被要求鑽研教理。這就是所謂將教理與思想研究，視為佛教研究前提的默契之淵源。

事實上，奈良和京都的大寺中，存有大量上述重要法會的資料，有代表性的包括東大寺、興福寺、延曆寺等。東大寺的資料現今保存在東大寺圖書館中，興福寺的資料在興福寺寶物館，延曆寺的資料多數收藏於叡山文庫。此外，名古屋的大須文庫、神奈川縣的金澤文庫，及其他歷史悠久的古寺院等，也是重要的收藏地。此類資料多為寫本，很多尚未翻刻或刊行，雖然漸漸出現了電子版⁸，但因各寺情況不同而較難得手的現狀仍然存在。

目前已經有刊本傳世的資料也很多，例如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撰述部」的一批資料就很有代表性。其中就包括法相宗之論義基本資料《唯識論同學鈔》、《唯識論本分抄》。這些相關資料，現已由SAT（由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次世代人文學開發中心主導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文本資料庫）電子化，但裡面某些資料的底本存在著一些問題。除《大正新修大藏經》以外，《日本大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等，也是極為重要的佛教叢書。另外，各宗派也在獨自開發、

⁶ 最初強調這一觀點的論文是上島享的〈中世前期の國家と佛教〉，《日本史研究》403，1996年。

⁷ 上島享，《日本中世社會の形成と王權》，2010年，頁228-292。

⁸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的古寫經計畫正在進行的工作，是將各地寺院所傳的古寫經電子化，方便大家從網路上閱覽日本古寫經資料庫。

編纂出版各宗叢書，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如《淨土宗全書》、《續淨土宗全書》、《天臺宗全書》、《續天臺宗全書》、《日蓮宗全書》、《真言宗全書》、《真言宗安心全書》等。毋庸置疑地，在這些大型叢書中收錄了極為珍貴的資料，但底本問題仍然存在。這些珍貴資料是以什麼樣的寫本為底本這一類的基本問題，還需常自警覺。

此類系列叢書一方面極為便利，但應用於研究時又存在一些問題，其中一些為圖讀解之便，甚至選擇一些並不合適的文本作為底本。面對此類問題，重新校訂文本就成為一道不可或缺的基礎工程。除了這些資料集之外，從 1970 年代開始逐漸出版一些新編叢書⁹。1990 年後，例如通過勉誠出版社的阿部泰郎和山崎誠的努力，出版了在名古屋真福寺發現的珍貴書籍影印版《真福寺善本叢刊》¹⁰。這裡面與寫本影印一起刊登的解讀與研究部分，勇於超越以前的問題點，為大家提供了許多幫助。除此之外，還有昭和 52 年（1977）到平成 19 年（2007）出版的《神道大系》¹¹，也包含了佛教相關資料。目前為止雖已出版了多種佛教有關的資料，但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亦即現在日本還未有出版一套如《日本大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同等規模的叢書計畫。

⁹ 最早應該是高山寺典籍文書總合調查團，從 1971 年開始出版的《高山寺資料叢書》（1971-2004 年）全 24 冊。

¹⁰ 其中較受矚目的是阿部泰郎、山崎誠等搜集的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的資料集，以及仁和寺紺表紙小雙紙研究會編的《仁和寺守覺法親王の儀禮世界—仁和寺藏紺表紙小雙紙の研究—》共 3 冊（1995 年）。此外，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的《真福寺善本叢刊》（第一期共 12 卷（1991-2000 年）、第二期共 12 卷 13 冊（2004-2011 年））及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前沿委員會編的《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I - VIII（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前沿委員會，2006-2014 年）等都是發現新資料的珍貴資料集。

¹¹ 《神道大系》的刊行在二戰前就已規畫但一度受挫，戰後成立財團法人神道大系編纂會，從昭和 52 年（1977）到平成 6 年（1994）出版正編 120 卷，平成 7 年（1995）到平成 19 年（2007）出版《續神道大系》50 卷。神佛相關資料就收集在「論說編」裡面。

三、對西歐學術研究的借鑒

明治以後的日本佛教研究，吸收了西歐的佛教研究方法，對現代日本佛教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留學歐洲的南條文雄（1849-1927）、高楠順次郎（1866-1945）、竺原研壽（1852-1883），在當時的印度殖民宗主國英國及德國，學習印度哲學與佛教的研究方法，並將其傳回日本，這是從基督教神學研究發展而來的文獻學研究方法¹²。

正確解讀佛教文獻逐漸成為佛教研究的主流，擅長解讀漢文的日本學者開始嘗試對比西洋傳來的梵語、巴利語印度佛教文獻與漢文佛典，日本的佛教研究由此確立並鞏固以文獻研究為主的學術傳統。這種方法主要以比對和研究寫本為主，儘可能收集同一文獻的不同寫本，通過比對校訂避免錯讀。除梵語資料，同時使用漢譯資料與藏譯資料，形成了風格獨特的佛教學研究方法¹³。

此方法的問題在於，研究格局日漸狹窄，並且對佛教的研究局限於文獻本身，忽略了對現實佛教的關注。這種傾向排斥文獻以外的資料，也將其他研究視為佛教學的邊緣領域，這一點不得不說是日本佛教學研究遺憾的一面。

¹² 明治以後的日本佛教相關的新研究成果，有末木文美士的〈アカデミズム仏教學の展開と問題点—東京（帝国）大學の場合を中心に—〉（收入《近代日本と仏教》，TranView 出版社，2004 年）、林淳的〈明治仏教から近代仏教へ〉（《禪研究所紀要》42，2013 年）、オリオン・クラウタウ的《近代日本思想としての仏教史學》（2012 年）、大谷榮一的《近代仏教という視座—戦争・アジア・社會主義》（2012 年）。

¹³ 末木文美士編，《近代國家と佛教》，《新亞洲佛教史》14，2011 年。

四、佛教學研究領域對文學文獻的關注過少

文獻當中還是有所取捨和偏重，有些直接與教理、思想相關的文獻更容易被擇取作為佛教學研究的對象，其他的則往往未予正面重視。例如，文學作品當中有受佛教影響很深的作品，即所謂的「佛教說話集」。還有平安時代重要的小說《源氏物語》也有濃厚的佛教因素存在，但是很少看到佛教學者從正面探討這個問題¹⁴。

因此，在研究日本佛教時，應注意除了僧侶或知識分子所撰文章以外，其他相關資料也要留意。例如，隨著佛教的流傳，非僧侶者所留下與佛教有關的資料，和歌和漢詩文即是典型的例子。從平安時代開始將佛教教理吟入和歌，這些和歌被稱為釋教歌，有許多資料流傳後世。勅撰和歌集中也有許多吟入佛教教理的和歌。這些都是可告訴我們當時佛教如何被（可能是）貴族階層吸收的好資料。

此外，平安時代初期流行創作漢詩文，其中讚嘆佛教的文章被稱為「漢讚」。資料有《和漢朗詠集》，不過很少有佛教學者研究。其實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就是佛教在平安時代初期被吸收的形態之一。漢詩文創作後來演變為和文的讚嘆，被稱為「和讚」，在日本中世以後大行其道。鎌倉時代以後，著名的和讚有親鸞《淨土和讚》、《高僧和讚》、《正像末和讚》，江戶時代的白隱《坐禪和讚》等¹⁵。

「佛教說話集」也是院政期以後大量出現的文學作品。早期的《日本靈異記》，十世紀的《三寶繪詞》、十一世紀的《法華驗記》、《今昔物語集》等不勝枚舉。這些資料主要是從日本國文學方面來研究，而佛教學領域對此乏人問津。況且，國文學者從佛教思想角度研究佛教說

¹⁴ 多屋賴俊的《源氏物語の思想》（1992年）是這些少數研究中的代表作。

¹⁵ 多屋賴俊，《和讚史概説》，1933年；坂東性純，《親鸞和讚—信心をうたう》，2010年。

話集的也不多¹⁶。

到了日本中世室町時代，開始出現很多不分佛、儒、神道，歌頌人間人倫道德的和歌，因此也被稱為道歌，學界也很少有人關注。自室町時代至戰國時代，歌頌家庭道德與家族倫理的道歌廣泛流傳¹⁷。尤其是戰國時代，警醒世人如何度過戰亂歲月的道歌大受歡迎，而道歌的廣泛普及與它們短小精練的詩文形式、朗朗上口、耳熟能詳的特點有很大關係¹⁸。

到了江戶時代中期，伴隨心學的隆盛開始出現道歌的集成歌集。此時的心學，因其創始人石田梅岩的名號而被稱為石門心學。時至江戶時代後期的十八、十九世紀左右，有些道歌集開始盛行在和歌之間穿插與其內容相符的風景畫。這種風氣的起源，似乎與傳唱一休事蹟之歌集流行有關。一休的相關作品最初期被稱為「狂歌」，日後才定名為「道歌集」¹⁹。

此後出現以三五圓月曆為代表，以「心」為主題的道歌集，至今傳世的著名歌集包括：《道歌：心之鞭策》、《道歌：心之寫照》、《道

¹⁶ 原因是日本國文學研究，自近世的本居宣長以來的傳統仍在發揮作用，即排除佛教影響而建立純粹的日本文學。作為佛教學者而將研究範圍擴大至日本的文學與和歌等，並注入較多精力的，應該說只有石井公成。例如他的論文有〈心を探る文學—『源氏物語』の唯心思想〉，《文學》2003年7、8月號及〈曖昧好みの源流—『伊勢物語』と仏教〉，《文學》2004年9、10月號等。

¹⁷ 道歌的研究中，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編的《道歌 心の姿見》（1998年），是少數有佛教研究者參與的研究。

¹⁸ 道歌研究中，著名的有八波則吉的《道歌清談》（1936年）、松尾茂編《道歌大觀》（1911年）、木村山治郎《道歌教訓和歌辭典》（東京堂出版，1998年）等。

¹⁹ 著名的有《道歌教訓道蒙早合點一休狂歌雀繪入》初編（B40-689）、後編（B40-689）。號碼是東大綜合圖書館藏書編號。

歌：心之明鏡》等。當時，道歌集開版刊行，加上租書屋的推波助瀾而在社會上流通甚廣。這是我們觀察當時庶民階層如何接觸佛教、理解佛教的珍貴資料。令人惋惜的是，這些重要的作品至今尚未引起佛教學者的足夠重視。

綜上所述，佛教學的研究領域確實存在偏重教理、思想文獻的傾向。若要全方位地洞察和理解佛教給予日本文化的廣泛深遠之影響，無論文學作品或流行於庶民階層的作品，都應納入佛教學研究的視野，並給予充分的重視²⁰。

五、時代區分以及學界對各時代研究關心之深淺

佛教傳入日本可追溯至六世紀上半葉的飛鳥時代。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佛教代表最先端的知識，是東亞世界平等共用的文化財富。佛教首先經朝鮮半島百濟國以官方途徑傳入日本，日益普及而深入人心。此後，歷經古代、中世、近世乃至近現代千百年間的繼承和發展，至今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但在佛教研究中，不同時代的佛教發展所受到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主要反映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是日本佛教史的斷代問題。以時代劃分來研究佛教極為普遍，但佛教史採用的斷代方法本身即存在著一些問題。本來，歷史斷代的方法屬於史學領域課題，而這個課題內部存在很大的爭議²¹。

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起緣於歐洲的歷史斷代概念和規定。為將日本史納入世界史的全域中，日本史研究也採用了同樣的斷代方

²⁰ 從此觀點來看，三橋正的《平安時代の信仰と宗教儀礼》（2000年）作為釐清貴族信仰的研究書，應值得注意。

²¹ 朝尾直弘，〈時代區分論〉，《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別卷1《歷史意識の現在》，1995年。

法。不過日本史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時，在中世和近代之間，加上了近世的概念作為向近代過渡的歷史階段。

一般的劃分如下：

古代＝飛鳥、奈良、平安時代

中世＝鎌倉、南北朝、室町、戰國時代

近世＝安土桃山、江戶時代

近現代＝明治時代以後

這種古代、中世、近代的斷代方法，其標準和依據究竟何在，各時代的特徵、起始年代應如何總結和劃分，事實上在史學家之間尚存在著歧義。

近年，有學者提出應將承平・天慶之亂作為古代和中世的分水嶺²²。如果說歷史時代的斷代標準是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前後的時代間存在顯而易見的差異，那麼目前一般認為到院政期為止是古代，院政期以後則為中世。有觀點認為從院政期直至戰國時代跨距過長，因此一般把南北朝開始到戰國稱為中世後期。也有觀點認為，從戰國時代到安土桃山時代前後，社會開始逐漸變化而進入近世，若將應仁之亂作為區隔時代的標尺，那麼事實上日本史自十六世紀初葉既已步入近世。爭議不大的唯有從明治時代為起點的近現代的劃分了。

第二個問題，時代劃分即使沒爭議，是否就意味每個時代的佛教都會受到同等的重視呢？實際並非如此。日本佛教的研究中，有些時代持續受歡迎，有些時代長期受冷落。研究者的興趣比較集中於中世前期，其他時代的佛教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古代和近世佛教的研究，出人意

²² 上島享，《日本中世社會の形成と王権》，2010年。

表的門庭冷落。

作為佛教傳來的黎明期，古代日本佛教很重要，但相關研究卻是個冷門²³，原因有多重。一個現實性的理由是，這時期的佛教與傳承至今的各大宗門教派之間淵源不深。另一個原因是資料有限，研究的開展倍受限制。尤為顯著的是研究古代初期之飛鳥時代佛教的學者，近年在史學領域也有減少的趨勢。不過近年來在考古學領域出現新的突破，尤其是朝鮮半島歷史與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希望能有效地推動這個時代的日本佛教研究²⁴。

如前所述，研究人員雲集的熱門課題明顯集中在中世前期。這個時代是今日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創始的黃金歲月，以各宗旗下的大學為首，中世前期佛教的研究歷久不衰。研究此時代的學者在佛教學領域、歷史學領域都較多²⁵。此外，1990年代以後對近代佛教研究逐漸在進步。1994年學術雜誌《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出版，1998年更名為《近代佛教》，至今研究活躍不已，佛教學、歷史學、宗教學與日本思想史學各領域多位學者加入研究陣容²⁶。

²³ 吉田一彦，〈日本佛教史の時期區分〉，大隅和雄編《文化史の構想》，2003年。

²⁴ 關於這方面，可以參考有働智瑛有關飛鳥時代的佛教研究論文，有働智瑛，〈古代肥後における仏教伝来—百濟達率日羅と麴智城出土遺物を中心として—〉，熊本縣教育委員會編《麴智城と古代社會》2，2013年。

²⁵ 例如平雅行、上島享、菊地大樹、原田正俊等，是研究中世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

²⁶ 關於近代佛教研究的專書，從池田英俊的《明治の仏教—その行動と思想》（1976年）開始被注意，之後有末木文美士的《明治思想家論》（2004年）、《近代日本と仏教》（2004年）、オリオン・クラウタウ（Orion Klautau）《近代日本思想としての仏教史學》（2012年）。不過以上專書都沒有從修行角度作考察。

六、對海外的日本佛教研究狀況之掌握過少

現在，對日本佛教的研究，不僅限於日本國內，在海外也很盛行。東亞的韓國、中國、臺灣等地都有為數眾多的日本學專家²⁷。在歐洲，英國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牛津大學等有研究日本宗教學和歷史學的專家²⁸。美加地區，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加拿大的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等各大名校，無論歷史學還是宗教學領域，都有日本佛教的專家執教²⁹。而且這些大學還培養了很多年輕學者，多數都曾來日本長期留學。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時而會被譯成日文介紹給日文讀者，但大多數還是用英語發表。日本的學者原則上應該關注並參考佛教的英文著作，但現狀不容樂觀，這方面仍有待改善。

此外，將海外與日本的研究狀況作比較，最不同的一點是海外並未把佛教學當做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如前所述，在日本研究日本佛教大都集中在佛教學、歷史學、日本思想史學等領域。不同於在日本佛教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海外的 Buddhist Studies 包含在宗教學、亞洲學、

²⁷ 例如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王勇（兼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院長）與王頌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高洪教授、韓國東國大學的金天鶴教授、台灣有中國文化大學的涂玉盞助理教授、義守大學的李守愛副教授與釋依昱副教授等。

²⁸ 例如倫敦大學的 Lucia Dolce 教授在研究以日蓮為主的日本中世佛教，劍橋大學的 Geino Sekimori 教授在研究日本的修驗道。

²⁹ 例如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的 Jacqueline Stone、哈佛大學的 Ryuichi Abe、維吉尼亞大學的 Paul Groner（2013 年退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 Mark Blum、南加州大學的 Lori Meeks、伊利諾大學的 Brian Ruppert、史丹佛大學的 Carl Bielefeldt、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 Steven Heine、卡爾頓大學（Carleton）的 Asuka Sango 及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 David Quinter 等為數眾多的研究者。

歷史學等學科裡面，因此對佛教的研究，較之教理與思想等方面，更多的聚焦於歷史、社會影響等方面。

七、寫本與刊刻資料的問題——通過與大藏經的對比校勘

現在，研究日本僧侶的著作之際，尤其是查閱其中對經論的引用時，一定會以大正新修大藏經來做確認，但這麼做有時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因為僧侶在著述時使用的經論大抵不是我們使用的刊本資料，而是以寫本形態流傳的文本。日本自飛鳥時代起，就有許多勤奮好學的僧侶，漂洋過海前往中國留學。日本的法相宗、三論宗就是在此背景下，或經朝鮮半島或直接從中國大陸傳來。彼時留學僧侶往往會將一批漢譯經論之寫本帶回日本。典型的人物是道昭（629-700）和玄昉（？-746）。道昭請回之經論先被收藏在飛鳥法興寺的禪院，遷都平城時，禪院及自唐攜來之經論寫本率先被移至新都。這些經書，從奈良時代乃至後世，經由多次輾轉傳抄，漸漸集成一叢書形態，這就是各地寺院所傳承的日本抄本一切經之源流³⁰。

事實上，即使木版印刷的大藏經（宋版一切經）從中國傳入日本後，日本的佛教徒仍舊重視奈良朝時代以來傳世的寫本佛典，有學者認為直到中世初期以後才開始使用木版大藏經³¹。另外，同一種佛典的寫本和版刻大藏經本之間有時內容有所差異。導致差異的明確原因還不甚清楚，可能是為了便於閱讀，也可能是為了遵從朝廷敕命，出於對當政者的顧慮而對經文本身做某些更動。這一點在研究時多加重視。

³⁰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前沿委員會編，《日本古写經善本叢刊》I - VIII，2006-2014。

³¹ 例如東大寺僧裔然（938-1016）所帶來的宋版大藏經蜀版一直收藏在東南院，但幾乎未被使用。此外，鎌倉時代的日蓮引用經論時，也會用源自梵釋寺抄本一切經的典籍。

大正新修大藏經變成電子檢索系統後使用變得非常方便，但我們要把電子版與寫本所傳經典之比較，時時放在心上。進而已有研究發現，同一材料在日本刊刻以前，會因不同時代的傳入導致受新版刊本之影響，而出現文字異同或記述增加，這點也需注意³²。

而且手寫的狀況下因親手書寫之字體多種多樣，因此會產生字體的問題。若以工整易讀的楷書體寫成，一般不會有讀錯的問題，但實際上以行書體、草書體一揮而就的情況比較多，還有些人因書寫習慣獨特而改變字形。文字的簡化雖有一定規則可循，不過負責書寫的僧侶中卻不見得一定受過此類訓練。例如中世的一代高僧日蓮上人，有眾多親筆資料傳世，他在不斷書寫的過程中形成了頗為獨特的筆法。這種情況下日蓮著作在轉抄成楷書體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的出現讀錯的機率；或轉成刊刻本印刷活字時，就顯得特別困難。

八、關於佛教徒法會活動之資料

佛教教團實際開展的活動，也是日本佛教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就作為傳承中國南朝佛教的部分來說，日本佛教法會活動的相關資料值得研究。這些法會活動的核心就是唱導、論義，其相關文獻資料被稱為「經釋」或「問答記」。唱導資料的集大成，要歸功於院政期的比叡山安居院僧人澄憲（1126-1203）和聖覺（1167-1235）父子二人，代表編著包括《釋門祕鑰》、《轉法輪鈔》等³³。這些大多是比叡山僧團活動的記錄。近年來還有很多新出資料問世，其中包括活躍於奈良東大寺的辨

³²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請參見池麗梅，〈《統高僧傳》研究序說—刊本大藏經本を中心として—〉，《鶴見大學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8，2013年。

³³ 關於此類資料集，可參見永井義憲、清水宥聖編《安居院唱導集》（1972年）及菘輪顯量，《日本仏教の教理形成—法會における唱導と論義の研究》（2009年）等。

曉的法會相關資料³⁴。諸如此類的資料以前不為人知，現在不斷的被發現。論義的傳世寫本數量也非常之多，多數製作於院政期至鎌倉時代，由奈良的僧侶保存下來³⁵。

目前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將寫本形態的資料轉寫為工整易讀的楷書印刷體，並加以廣泛介紹。此類唱導資料的研究尚停留在搜尋美文麗句的典據出處，比對文句表達上的歷代傳承等階段，思想研究並不多³⁶。至於論義資料，現有宗派的內部資料，例如天台宗論義資料等的研究已經有一定的累積，但是中世前半期以前的，與現存宗派關係不大的論義資料的思想研究，相對進展緩慢³⁷。論義中會出現「業義」、「副義」等論題，其中副義就是與因明相關的。其中因明的相關研究，自武邑尚邦出版《因明學一起源と変遷》以來，幾乎沒有任何發展。日本的因明研究應該也是今後的課題之一³⁸。

研究上述法會活動的資料，通過查閱典據加深內容理解，闡明思想，釐清當時僧侶的學問體系等，對於受過佛教學訓練的學者來說，應

³⁴ 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編《称名寺聖教尊勝院弁曉説草一翻刻と解題》，2014年。

³⁵ 由東大寺圖書館編的《東大寺和本目錄》即該館之藏書目錄、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興福寺典籍文書目錄》全四卷，1986年等。

³⁶ 關於唱導資料的研究，有大島薰〈《花文集》解題〉，真福寺善本叢刊2《法華經古註釈集》，2000年。

³⁷ 歷史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包括永村真，《中世東大寺の組織と経営》（1989年）及《中世寺院史料論》（2000年）。另外《南都佛教》77號（1999年）是法勝寺御八講相關研究的特輯專號。

³⁸ 日本學界關於因明的研究，基本參考書有宇井伯壽的《仏教論理學》（《宇井伯壽著作選集》第1卷，1966年）和武邑尚邦的《因明學一起源と変遷》（1986年、2011年新裝版），但後繼乏人。目前只有花園大學的師茂樹在傾注心力。參見師茂樹關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東アジア仏教論理學の形成と展開：唯識比量をめぐる文化交渉を中心として》，2013年，未出版。

該沒有問題，但真正的難處在於如何闡釋法會中的論義所發揮的社會性功能。也就是說，隨著問題意識的轉移，現有的佛教學方法論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但有時也束手無策，我們要清楚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上述關於教團的社會性功能等問題，依然不得不仰賴歷史學的方法論。

九、問題之所在及有效的方法論——以行門為研究對象時

最後，讓我們談談問題的所在和有效的方法論。佛教的傳承涵蓋「學」與「行」兩大領域，但是多數的文字資料記載明顯偏重於「學」。佛教學的方法，非常擅長處理「學」，尤其是那些闡述教理的資料。自古相傳的佛教資料當中，「學」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畢竟它們歷來倍受關注，得以珍重收藏和細心鑽研。

但是，作為佛教傳承的另一重要基石，所謂止觀之實踐的「行」不容忽視。「行」有時也涵蓋社會性實踐的部分，但是筆者在此強調的「行」，是止觀這種觀心的實踐³⁹。

這一傳統的「行」的重要層面，很少被文字資料記載，即使捕捉到吉光片羽，其描述又往往採用象徵性手法，晦澀難解。而且僅靠字面的分析，難以深入其真正內涵。佛教學研究慣常注重文字涵義的正確解讀，而此類文獻學的方法論用於解讀例如禪宗所留存之「行」的相關資料，可以說是鞭長莫及，無法詮釋。這也就是佛教研究中文獻學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象徵性手法的描述究竟真義何在，為了揭示真相，我們有必要轉換新的觀點。例舉一典型例子，日本中世禪宗的圓爾辨圓（1202-1280）就提出了一種特殊的佛教三分類法，將佛教分為「理知」、「機關」、「向上」三種。所謂「理知」，就是通過語言所傳達的普通教理，例如，

³⁹ Carl Bielefeldt, "Practice",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m*, 2005.

緣起、空等就是理知的範圍。所謂「機關」，指那些包含絕對矛盾的公案。最後就是「向上」，這是佛陀教誨中最高深的精髓，具體而言，就是所謂的「山是山、水是水」。想要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深刻境界，顯然僅靠精確地解讀文獻是不夠的。

日本佛教並非單純僅有「教」、「行」兩個層面。畢竟佛教的三寶包括佛、法、僧，要全方位理解佛教的發展，就需要全面理解佛、法、僧各個層面。但是，單就僧，即僧團的實際情況而言，僅僅依靠以教理為中心的文獻，也就是所謂「聖教」資料，也還是遠遠不夠的⁴⁰。

若明瞭自己的研究目標在於揭示日本佛教僧團的實態，掌握寺院內僧團的日常活動整體狀況，那就必須樹立與此目標相配的方法論。例如，若將寺院內收藏的行政文書作為研究對象，就能揭示寺院經濟與運作實情，也能明確把握僧人的晉升體系等。遺憾的是，佛教學的文獻學方法論在這方面顯得力不從心，而歷史學者對此領域的資料，已累積了眾多成果，有待我們應用於佛教研究中。

顯然，研究的目的不同，其方法論與對應的資料自然要有相應的變化，這點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自覺。

十、結論

日本佛教的研究牽涉領域眾多，包括佛教學、歷史學、日本思想史學、國文學及宗教學等。而且不同領域涉及日本佛教之際，其問題意識與關注點也各不相同。在佛教學內部，用以往的方法論研究教理及思想，的確累積了紮實的成果，但是只要關注點發生轉變，我們必須去檢驗以往的方法論與資料的有效性。例如若我們從以往佛教學研究未曾觸

⁴⁰ 蓑輪顯量，〈〈仏教學〉再考—教理研究と修行実践—〉，《日本仏教綜合研究》10，2012年。

及的「行」的世界，即僧人如何去實踐修行作為出發點來理解佛教，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從嶄新的觀點去開拓。

日本的佛教不僅是一種悠久的傳統，也是延續至今並實踐於當今日本社會的宗教，我們不可能無視其現狀，它也應該成為我們關注的研究對象。此時的重點，將不再是文獻的記錄，而是活躍當今的僧團真人實事。

他們的活動多種多樣，卻不見得有明確的意圖要將所有活動載於文字。此時，以文獻學為基礎的佛教學研究方法顯得束手無策，迫使我們開拓更為有效的方法。或許，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參與觀察法更為有效。佛教學領域的研究應該不限於教理、思想研究，現在即是到了以前者為基礎，將現代佛教納入視野的時代了。



引用書目

- 八波則吉，1936，《道歌清談》，東京：實業之日本社。
- 山岸常人，2004，《中世寺院の僧団・法會・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上島享，1996，〈中世前期の國家と仏教〉，《日本史研究》403。
- 上島享，2010，《日本中世社會と王權》，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
- 大谷榮一，2012，《近代仏教という視座—戦争・アジア・社會主義》，東京：Perikansha 出版社。
- 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編，1998，《道歌心の姿見》，東京：芙蓉書房。
- 大島薫，2000，〈《花文集》解題〉，真福寺善本叢刊2《法華經古註積集》，京都：臨川書店。
- 三橋正，2000，《平安時代の信仰と宗教儀礼》，東京：續群書類叢完成會。
- 木村山治郎，1998，《道歌教訓和歌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
- 仁和寺紺表紙小双紙研究會編，1995，《仁和寺守覚法親王の儀礼世界—仁和寺蔵紺表紙小双紙の研究—》全3冊，東京：勉誠社。
- 刈部直、黒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田尻祐一郎編，2012-2013，《日本思想史講座》全5卷（内4卷已刊），東京：Perikansha 出版社。
- 水野敬三郎，1996，《日本彫刻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 石井公成，2003，〈心を探る文學—《源氏物語》の唯心思想〉，《文學》7、8月号。
- 石井公成，2004，〈曖昧好みの源流—《伊勢物語》と仏教〉，《文學》9、10月号。
- 石母田正，1946，《中世的世界の形成》，東京：伊藤書店。
- 田中公明，2004，《兩界曼荼羅の誕生》，東京：春秋社。
- 末木文美士，2004，〈アカデミズム仏教學の展開と問題点—東京（帝國）大學の場合を中心に—〉，《近代日本と仏教》，東京：Transview 出版社。
- 末木文美士，2004，《明治思想家論》，東京：Transview 出版社。
- 末木文美士，2004，《近代日本と仏教》，東京：Transview 出版社。
- 末木文美士編，2011，《近代國家と仏教》，《新アジア佛教史》14，東京：

佼成出版社。

- 永井義憲、清水宥聖編，1972，《安居院唱導集》，東京：角川書店。
- 永村真，1989，《中世東大寺の組織と経営》，東京：塙書房。
- 永村真，2000，《中世寺院史料論》，東京：吉川弘文館。
- 有働智煒，2013，〈古代肥後における仏教伝来—百濟達率日羅と麴智城出土遺物を中心として—〉，熊本県教育委員会編《麴智城と古代社會》2，熊本：熊本縣教育委員会。
- 吉田一彦，2003，〈日本仏教史の時期区分〉，大隅和雄編《文化史の構想》，東京：吉川弘文館。
- 宇井伯壽，1966，《仏教論理學》，《宇井伯壽著作選集》1，東京：大東出版社。
- 池田英俊，1976，《明治の仏教—その行動と思想》，東京：評論社。
- 池麗梅，2013，〈《統高僧伝》研究序説—刊本大藏經本を中心として—〉，《鶴見大學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8。
- 多屋頼俊，1933，《和讃史概説》，京都：法藏館。
- 多屋頼俊，1992，《源氏物語の思想》，京都：法藏館。
- 辻善之助，1944-1953，《日本仏教史》全10卷，東京：岩波書店。
- 伊藤聰，2011，《中世天照大神信仰の研究》，京都：法藏館。
- 坂東性純，2010，《親鸞和讃—信心をうたう》，東京：日本放送協會出版。
- 佐和隆研，1961，《日本の密教美術》，京都：便利堂。
- 佐藤弘夫，2010，《日本國家と宗教》，東京：吉川弘文館。
- 東大寺圖書館編，《東大寺和本目錄》，奈良：東大寺圖書館。
- 林淳，2013，〈明治仏教から近代仏教へ〉，《禪研究所紀要》42。
- 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1991-2000，《真福寺善本叢刊》第一期全12卷，京都：臨川書店。
- 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2004-2011，《真福寺善本叢刊》第二期全12卷13冊，京都：臨川書店。
-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前沿委員會，2006-2014，《日本古写經善本叢刊》，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
- 武邑尚邦，1986（2011年新裝版），《因明學—起源と変遷》，京都：法藏館。

- 松尾茂編，1911，《道歌大觀》，東京：光融館。
- 高山寺典籍文書總合調査團編，1971-2004，《高山寺資料叢書》全24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編，2014，《称名寺聖教尊勝院弁曉説草一翻刻と解題》，東京：勉誠出版。
- 黒田俊雄，1975，《日本中世の國家と宗教》，東京：岩波書店。
- 朝尾直弘，1995，〈時代区分論〉，《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別卷1《歴史意識の現在》，東京：岩波書店。
- 曾根原理，1996，《徳川家康神格化への道—中世天台思想の展開》，東京：吉川弘文館。
- 源了圓、玉懸博之共編，1992，《國家と宗教》，日本思想史論集，京都：思文閣。
- 源豊宗，1978-1994，《日本美術史論究》全6卷，京都：思文閣出版。
- 源基定，1839，《道歌教訓道蒙早合點一休狂歌雀絵入》初編・後編。京都：堺屋仁兵衛。
- 網野善彦，1984，《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東京：岩波書店。
- 蓑輪顕量，2009，《日本仏教の教理形成—法會における唱導と論義の研究》，東京：大藏出版。
- 蓑輪顕量，2012，〈〈仏教學〉再考—教理研究と修行実践—〉，《日本仏教綜合研究》10。
- 頼富本宏編，1994，《密教の美術》，京都：法藏館。
- 横超慧日，1958-1979，《中國仏教の研究》全3卷，京都：法藏館。
- 藤井恵介，1998，《密教建築空間論》，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 オリオン・クラウタウ (Orion Klautau)，2012，《近代日本思想としての仏教史學》，京都：法藏館。
- Bielefeldt, Carl. 2005, "Practice",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